

2013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

袁立莉◎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014042751

2013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

G12

130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

袁立莉◎著



北航

C1729198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G12
1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 / 袁立莉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81129 - 668 - 6

I. ①东… II. ①袁… III. ①传统文化 - 民族主义 -
思想评论 - 中国 IV. ①G12②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7791 号

“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

“DONGFANG WENHUAPAI”SIXIANG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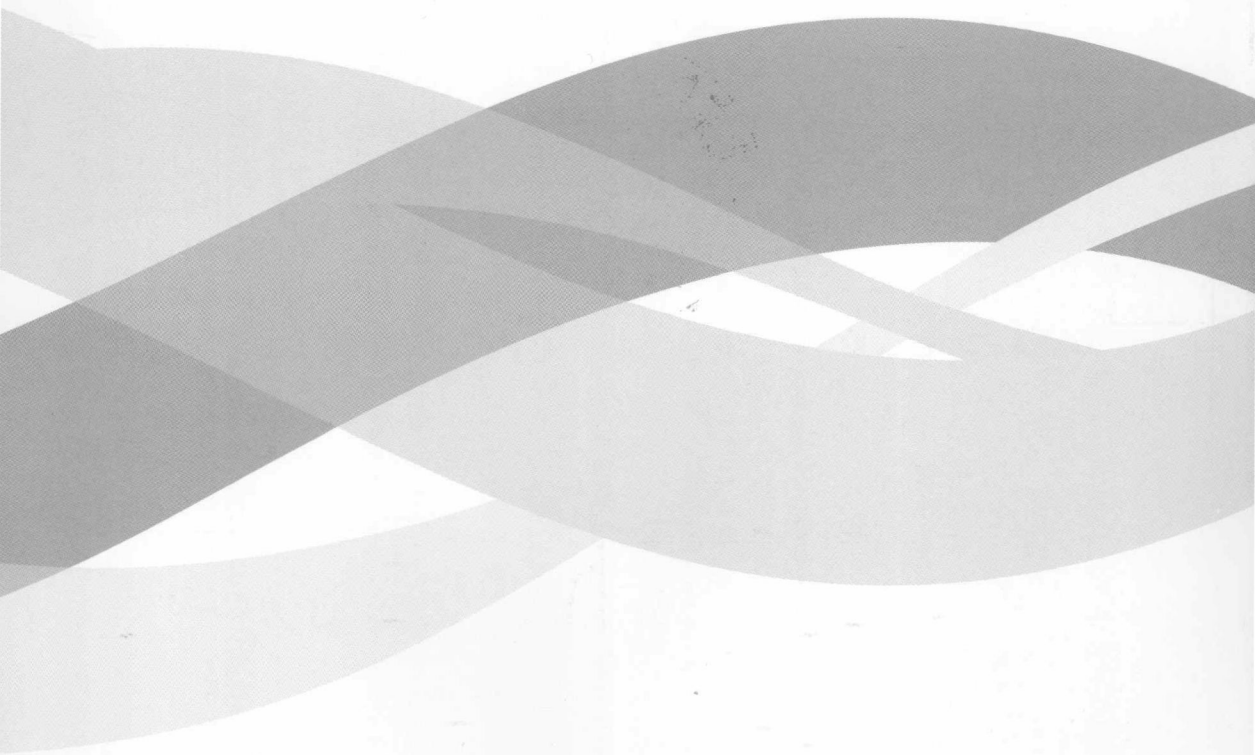
袁立莉 著

责任编辑 张怀宇 刘 杰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88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668 - 6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最终成果, QW201128



目录

导 言/1

第一章 “东方文化派”思想概述/15

第一节 “东方文化派”的兴起/15

第二节 “东方文化派”思想内涵/20

第三节 “东方文化派”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30

第二章 杜亚泉的东方文化思想/38

第一节 折中主义的文化观/39

第二节 新文化的建设/45

第三节 杜亚泉和陈独秀的文化论战/50

第三章 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救世说/59

第一节 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嬗变/60

第二节 文化调和论/66

第三节 民族文化与爱国论/73

第四章 梁漱溟的东方文化理论与实践/79

第一节 “三大文化路向说”/80

第二节 东方文化理论/88

第三节 东方文化理论的实践：乡村建设/104

第四节 相应的总结与评价/110

第五章 张君勱的“中国文化”构思/114

第一节 科学观与玄学观/115

第二节 对西化思潮的批判/124

第三节 中国民族文化的走向/131

第六章 章士钊的文化保守主义/140

第一节 《甲寅》时期的文化调和论/141

第二节 “以农立国”的主张/146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建设/152

第七章 对“东方文化派”的追问与反思/159

第一节 对于“东方文化派”的历史评价/159

第二节 基于现代视域的价值审视/166

余论 “东方文化派”伦理观评述/174

结 语/194

参考文献/196

后 记 /206

导 言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东方文化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一批以东西文化论战为契机，进而倡言东方文化足以救西方文化之弊、主张弘扬和光大东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及其观点的总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勱、章士钊等。与同时期出现的复古派、国粹不同，“东方文化派”的理论主张进化，认同吸收西方文明之精髓以重建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又与主张文化激进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在理性地批判、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时，始终坚持文化民族主义操守。

在“东方文化派”的视野中，民族文化有着固有的价值，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复兴才能最终解决。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出现的现代新儒家、中国文化本位派等学术群体的理论学说。“东方文化派”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强调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文化转型的秩序性，主张在有选择的基础上保存传统文化，并反思、借鉴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成果，以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方式建立“新文化”，最终确立了近现代中国文化改造和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方法范式。

“东方文化派”形成于一个以“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为主题的年代，身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民族危机的特定社会情境，自然它的学说观点中会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迹。而这些印迹又造成了其独特的学术特征与鲜明的文化立场，并在近现代中国思想中发挥出重要的

作用。

“东方文化派”的主要思想有哪些？其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的代表人物、理论主张有何特点？其思维理路的合理性在哪里？它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贡献有什么？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它与西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其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或缺失在何处？到了今天，它是否还能够对当代学术思潮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与探索，无疑会让人们更好地了解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变，更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华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即使仅作为对一个学术群体的个案研究，其相应的理论意义与成果价值亦不可简单估量。

然而遗憾的是，“东方文化派”产生至今已 90 余年，后来学者对它的学术价值关注度却始终不高。人们或是将其剥离为一个个单独的人物学说个体、分别进行阐述，或是将其视为封建保守的代名词、近现代中国文化进步的对立物进行批评指责。即使有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涉及某些“东方文化派”问题，也往往一笔而过，并未做出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本书要做的是，以文献分析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史观，以多元化的视角，对“东方文化派”的发展历程、代表学说、学术特征、价值审视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解析。尝试以新的思路梳理“东方文化派”学说精髓，以新的方法探求“东方文化”价值真谛，力争得到更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获得更多创新成果，为完善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应有贡献。

当前，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了激烈的文化转型。如何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与新文化间的关系，如何建构一种能够合理处置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文化改造模式，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东方文化派”对于中西文化的探讨，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文化激进主义者的争论中，可以找到诸多借鉴。也许，这是本书的又一价值所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

1. 杜亚泉：杜亚泉是“东方文化派”的创始人，《东方杂志》主编。长期以来，因其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发生过激烈争论，而被社会主流意识认为是守旧派人物，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除了其逝世后有几篇悼念文章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学术界反思“文化激进主义”和“现代化弊端”的大背景下，方被学者所提及。1993年，《杜亚泉文选》的出版及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让杜亚泉及其思想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主流行列中。

1993年，王元化在《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文中，首次把杜亚泉评定为“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①，并对其温和渐进的改革主张予以了肯定。1994年，刘润中在《杜亚泉（伧父）文化思想》一文中，将“文化‘三期发展’说和‘中国文化病变’论”、“文明进化的‘分化’与‘统整’”、“东西文明的调和与趋新”等界定为杜亚泉文化思想的基本纲要。1998年，徐芳维撰文《杜亚泉文化观评议》，对杜亚泉文化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学者们对于杜亚泉思想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与陈独秀的论战上。高力克《重评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陈秀萍《重评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战》，董恩强《杜亚泉的文化思想——兼评杜、陈文化论争》，李新宇《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刘长林、班彦美《解决中国问题的“道德本位”思想倾向——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道德观之比较》等均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学者们摒弃了原有的对于杜亚

^①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文存》，许纪霖，田建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3页。

泉批判的视角,以更为客观的视角分析杜、陈二人理论的优点与不足,为人们给出了此次论战的公正评判。

此外,郑师渠、史革新在《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一书中,对杜亚泉的调和论有所提及,对之做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认为杜亚泉的文化主张并没有违背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只是较为稳健而已。^①刘黎红在专著《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中,完整地剖析了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新旧文化调和说。至此,杜亚泉文化学说内容基本上被学者所涉猎。

2. 梁启超: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对于梁启超“东方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繁多,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论说及其对中国固有文化捍卫的宣传上。在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樊中原的《孙中山与梁启超民族主义之比较研究》以及李国祁等编著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等著作中,专门辟出了整章篇幅介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许纪霖在论文《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中,将梁启超的思想归类于族群民族主义,认为其学说更多地受到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的影响。同时民族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分层,晚清的国民民族主义更接近共和爱国主义,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则转向了文化民族主义。许小青在《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一文中,为梁启超民族国家内涵划分出三大要点:主权与民族国家,国民与民族国家,国家至上。并认为,其思想既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吸收和转化,也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融合。^②

关于对梁启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在易新鼎的《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沈大德、吴廷嘉合著的《梁启超评传》,董德福的《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李喜所主编的《梁启

① 郑师渠,史革新:《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② 许小青:《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02页。

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等专著中给出了详尽的论述。学者们从梁启超从反传统到拥护旧文化的原因出发,对其思想的转变原因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关键英在《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一文中认为,造成梁启超文化观矛盾善变的主要根源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和调和主义的文化原则。郑师渠在论文《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中指出,梁启超思路的转向是一种文化自觉,这种自觉富有合理性与前瞻性,大大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代表此时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向度。国外学者约瑟夫·阿·勒文森对此也发表了看法,他在专集《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写道,梁启超一出场就面临并试图缓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他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的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①

3. 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出版了专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后人对其文化思想的研究就一直未有间断。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诸多层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应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丰硕。美国人艾恺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是海外研究梁漱溟东方文化思想和社会活动代表性专著,作者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对其文化哲学思想、乡村建设思想进行了清晰的解剖。郑大华的《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以梁漱溟的人生经历为基本线索,重点突出了其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对于“东方文化”思想建构做出的杰出贡献。曹跃明的《梁漱溟思想研究》一书,对梁漱溟哲学思想、文化思想、乡村建设理论、宗教观等各方面做了系统梳理和综合性研究,得出了颇多有意义的结论。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等书,则以客观的、唯物史观视角对梁漱溟的“东方文化”理论实践给出了评定。

^① 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研究论文方面,陈来撰写的《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一文,认为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反对反东方文化;他不是反对科学民主,而是始终肯定“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不是代表农业宗法封建思想,而是认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与其说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文化多元主义;他的思想不是站在“过去”而“反现代化”,乃是站在“未来”来“修正”资本主义。熊吕茂在《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容受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既不限于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之争,也不限于在狭隘的眼界中讨论中国民族之前途,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① 上述两篇文章基本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可以看到对于梁漱溟的“东方文化”思想,褒多于贬已是不争的事实。

4. 张君勱: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国内研究张君勱最早、最全的作品是吕希晨、陈莹选编的《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勱新儒学论著辑要》,该书详尽介绍了张君勱的宪政思想与人生哲学。后来,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分析了张君勱的精神自由思想;许纪霖的著作《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勱与现代中国》通过对黄炎培与张君勱思想进行的比较,揭示后者的自由民族主义理论。郑大华的《张君勱学术思想评传》从总体上把人们对张君勱的思想进行概括;陈先初的《精神自由与民族复兴》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张君勱的思想体系。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中国大陆思想界中被逐渐“淡忘”了张君勱“东方文化派”思想重又被人提及。

柴文华在《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一书中,专列一章介绍张君勱的西方文化观与中国文化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张君勱儒学著作集》,对其文化思想进行了汇编。吕希晨在《评张君勱新儒学的文化

^① 熊吕茂:《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73页。

观》一文中，从文化概论、中西的文化特征入手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张君勱；张振国在《胡适与张君勱的自由主义比较》一文中，通过个案比较清晰地展示了张君勱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态度。不过与梁启超、梁漱溟等其他“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的研究文献相比，关于张君勱的论述，学术界略显不足。

5. 章士钊：2000年，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的《章士钊全集》的出版，让沉寂多年的章士钊思想得以被学术界广泛认知。人们发现，章士钊原来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思想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语言、法理、新闻。但是相关的研究也显得有些分散。

对于其政治、经济思想的研究，代表作有丁仕原的《二十世纪的一面镜子：章士钊论稿》和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两位作者重点介绍了章士钊的政法思想与农业立国思想。郭华清的《〈甲寅〉时期章士钊的哲学思想——调和论》、李华兴的《从传播欧洲思想到回归传统文化——〈甲寅〉时期章士钊思想研究》等文，是研究章士钊文化思想的力作。彭漪涟的《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一书，专设一节讨论了章士钊的逻辑思想与成就。李日、郭春香的《试论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和郭双林的《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文法体系》则从语言学专业的角度，分析了章士钊的语言学造诣及其贡献。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关章士钊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李吾的《无行文人章士钊》，李立明的《〈柳文指要〉章士钊》，林熙的《从甲寅杂志说到章士钊》等文，可算作较有影响的成果。

不过对于章士钊“东方文化”思想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仍可算作空白，学者应加倍努力弥补这一缺憾。

（二）“东方文化派”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关系的研究

代表著作：张岱年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李毅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刘军宁《保守主义》，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陈少明等《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大隈重信《东西方文明之调和》等。

代表论文：郑大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何晓明《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论》、《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柴文华《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马庆钰《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检省》，黄玉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胡逢祥《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李毅《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史观及其实质》，喻大华《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思潮的困境与歧路》等。

学者们普遍认为，“东方文化派”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期。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推进的新态势、新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西方的没落”以及中国发生的与之相对应的新变化，是“东方文化派”发展、壮大的时代背景。民族立场与忧患意识、人文精神与反科学主义、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变易意向与中庸准则等基本特征，让“东方文化派”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力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发生了关于东西文化、传统道德等的论战，实质上是世纪之交新旧思想、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直接较量，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为更多国人所认可，社会中的诸多过激文化变革思想得到了有益的修正。

(三) “东方文化派”与中国近代思想史关系的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东方文化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学术地位、历史意义及其日后影响。郑师渠认为，“东方文化派”鲜明地揭示出复兴中国文化裨益世界的宗旨，由此它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特色、独立价值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融合诸多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并与西化派展开论争，为国人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① 欧阳哲生认为，将“东方文化派”等文化保守主义学派简单地看作封建文化的泛起，并加以彻底否定，是不公允的。因为它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在处理文化传统的承接关系上，有自己独到的长处；它也并未完全隔绝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且大多数学者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并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② 暨爱民指出，“东方文化派”置中国文化于世界的广阔视野中设论，目标又回到中国民族的强盛，这即为本身设定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肯定中西文化的优长互补，在现代化的世界中，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应该有相应的变革。这体现出国人的现代自觉和融合世界的开放性。^③ 皇甫晓涛则认为，“东方文化派”的“中国文化复兴”思想带来了民族精神的觉醒，其对日后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文化本位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学说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亚洲国家与政区的一种普遍共识^④，这恰恰表明了“东方文化派”学说的前瞻性。

除了上述成果外，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先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近代“新学”——中国传统

① 郑师渠：《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中国近代史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1页。

② 欧阳哲生：《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述评》，《求索》1990年第1期。

③ 暨爱民：《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8页。

④ 皇甫晓涛：《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皮明庥的《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高力克的《求索现代性》，蒋梦麟的《西潮与新潮》，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等诸多专著中对此问题也做出了详尽分析。

（四）对文献的简要分析

应当说，学者的研究赋予了“东方文化派”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合法性地位，规范与统一了“东方文化派”研究范式，梳理与创新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为“东方文化派”思想被人们关注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相应研究也存在一些遗憾。首先，过于注重个案研究，缺少宏观、整体上的把握。学者的相关论说多是只言片语，专题论文偏少的情况一直未有改变，至今未见关于“东方文化派”思想的系统性专著。其次，还存在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如“东方文化派”学说的理论渊源、思维理路整理、研究范式的确立、代表人物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其思想中内在在现代合理性的探寻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若不对上述内容进行研究，国内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东方文化派”理解的不全面，甚至误解难以改变。最后，在具体人物研究中，以往研究常常不能将人物的“东方文化”思想在众多思想中单独提炼出来，通常将之混杂在文化保守主义学说、守旧复古观点中。须知，“东方文化派”学者由于处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他们的许多论说的主旨思想是经常嬗变的，有时甚至会前后不一致，如果不加区分地统一将之归于“东方文化派”思想，定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本研究的价值意义得以体现。本书将在对全面的一手文献的分析基础上，对“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的“东方文化”思想进行一一梳理与系统研究，通过努力，尝试对至今尚未解决的有关“东方文化派”的问题给出较为圆满的答案。

三、核心概念解析

“东方文化派”学术思想庞杂，内容涉及广泛。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对其核心概念的解析显得必要而迫切。

首先对于“文化”的理解。一般来说，“文化”可以是生活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学术意义上的。生活意义上的“文化”多指知识的修养，受过教育的程度，有着“有文化”与“没文化”的区分。而学术意义上的“文化”意义显然要复杂得多。它是一个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内容。它既可以是物质的，又可以是非物质的；既可以涵盖一切与自然景观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也可狭义地限定于特定的精神文化或思想文化，如哲学、文艺、科学等。

文化形成后有着内在的结构，其最小组成单位是文化特质。一个社会中所有文化内容组合在一起的特殊形式称为文化模式。在文化模式上被人们争论最多的是“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两种倾向。“文化中心主义”又称“种族中心主义”，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常常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最好的、优于他人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是不能评价和比较的，因为如果从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赖以生存的环境看，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之间没有优劣之分。

而在“东方文化派”那里，他们通常将中西文化的时代性差别说成是民族性的不同，并自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价值远高于西方文化，兼具了“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双重特性，并进一步造就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所谓“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文化精神为民族精神之灵魂、以文化复兴为民族复兴之要义，倾力于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它试图通过振兴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标志、民族个性和民族魅力凝聚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达到民族国家的精神新生、精神完整与精神独立。它与“文化保守主义”关系非同一。“文化保守主义”本质上